

吴晞 著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书目文献出版社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吴 晞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吴晞著.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ISBN 7—5013—1309—1

I. 从… II. 吴… III. 图书馆事业—文化史—中国 IV.
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959 号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吴 晞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河北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1875 印张 112 千字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 3000 册

ISBN 7-5013-1309-1

G·359 定价:6.80 元

序

有关中国图书馆史的论著已不为少,但总有一个问题没有说清楚,这就是中国图书馆由来的问题。通常的说法,大都以为中国图书馆之源乃中国古代藏书楼。此说貌似合理,实为牵强。事物之变迁有不同情况,一是旧事物自然发展而转变为新事物,二是旧事物寿终而为新事物所取代,两者皆属正常,无所谓“好”或“不好”。旧事物完成了既定使命,或者是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就要被淘汰,就有可能被与之不同的新事物所取代,此类事情极多,图书馆取代中国传统藏书楼即属此。

史之究当以实为据。治史固不免有感情因素掺和其中,但仍以尽量少一点为宜。中国图书馆之源不在中国而在西方不足为奇,承认事实会使头脑清醒一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之源不也是不在中国而在西方么?西方科学始入中国之时,曾有不少士大夫对此难以接受,甚至因而创“西学东源”之说,也曾热闹一时,不过终因有违事实,亦无补于事,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了。西学源于欧洲,并非中华土产,从头学起比自以为是好得多。

图书馆与藏书楼(均以其实质而言而非以其名称为据)为两种不同性质之事物。图书馆源于西方自有其历史、社会、文化多种原因,图书馆之所以不源于中国亦同样有其自身的理由,探明这些问题不仅有史学上的价值,同时也有现实的意义,可惜以往对这些问题研究得太少了。

中国的藏书楼早已为图书馆所取代,但是藏书楼的思想

是否都已为图书馆的思想所取代？对图书馆事业是否已具共识？时至今日，我看未必。正当世界图书馆潮流又处于急剧变革之际，以史鉴今，绝非多此一举。

读完吴晞同志的书稿，似是吸进了一口新鲜空气。这部篇幅不大而资料丰富的著作的新鲜之处，在于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应当正视和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还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比较平正的镜子，用这样的镜子可以照出我们现在的模样，也有可能照亮我们的前程。

潘永祥

1993年初夏于承泽园

目 录

序.....	(1)
一、绪论	
——中国图书馆的产生	(1)
二、藏书·藏书楼·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的渊源	(6)
三、天下万世共读之	
——早期的藏书开放思想.....	(13)
四、炮舰·福音书·图书馆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图书馆.....	(22)
五、千年惊梦后的呼唤	
——新式图书馆思想的形成.....	(36)
六、冲破藏书楼的藏书楼	
——早期图书馆的出现.....	(52)
七、新型的官学藏书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59)
八、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河	
——古越藏书楼.....	(73)
九、策府弦歌唱神州	
——各省图书馆及京师图书馆的建立.....	(80)
十、附录：	(87)
(一)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	(87)
(二)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藏书规和观书约	(89)
(三)上海图书馆史(节录)	(91)

(四)藏书	(105)
(五)请推广学校折	(107)
(六)万本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	(113)
(七)记尚贤堂	(116)
(八)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节录)	(116)
(九)论学会	(118)
(十)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	(122)
(十一)同文馆书阁藏书	(125)
(十二)记筹办书藏经过	(125)
(十三)官书局开设缘由	(127)
(十四)官书局奏开办章程	(129)
(十五)京师大学堂章程(节录)	(131)
(十六)奏办京师大学堂(节录)	(132)
(十七)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1907年)	(134)
(十八)古越藏书楼记	(140)
(十九)为捐建绍郡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	(141)
(二十)古越藏书楼章程	(143)
(二十一)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	(149)
(二十二)筹办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纪事	(151)
(二十三)张之洞筹建京师图书馆纪事	(153)
(二十四)学部奏准派编修缪荃孙等充图书馆监督 各差片	(154)
(二十五)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	(154)
(二十六)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 章程折	(157)
后记	(160)

一、绪 论

——中国图书馆的产生

本书旨在论述我国图书馆——或称近代图书馆——萌芽、产生和最后形成的历史。但在探讨这一论题之前,首先要搞清什么是中国的图书馆,并对我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一些不够明确的问题做出必要的论证。

我国图书馆史研究论著中的一个极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图书馆源远流长,迄今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说起中国的图书馆,定要追溯先秦的甲骨、简策,言必称官府、书院、私家三大藏书系统,似已成为定制。然而,近代社会之前的中国图书馆,尽管历史悠久,灿烂辉煌,但它们都不是“图书馆”,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馆。当然,在一般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近代之前的文献收藏称之为古代图书馆,而后的称之为近代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本书中,前者称之为藏书和藏书楼,后者才称之为图书馆。但是,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二者不论叫什么名称,都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物。古代的藏书和藏书楼至多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渊源,但决不是

它的母体和前身。如果说在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思潮的初期，中国人总是要以“中华古已有之”的态度来看待西方新事物的话，那么在今天，这种认识只能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羁绊了。

有许多人是这样描述近代社会中的图书馆的：十九世纪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已落后于西方。后来逐渐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和管理方法，因此才产生了重要的进步和飞跃。其实这种看法也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的藏书、藏书楼和西方的图书馆之间，不是什么落后与先进的差别，而走的是南辕北辙的两条道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近代社会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藏书楼再发展若干世纪，也没有可能自行演变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中国的旧式藏书楼中缺乏进化演变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主要是缺少面向社会开放的因素，因此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差别和先进与落后是两回事。

还有一种更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即认为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中国藏书楼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封建性的旧式书藏发展过渡为新型的近代图书馆。这种解释用于西方图书馆的历史发展是比较恰当的，而用于中国图书馆则不妥。西方图书馆的历史源于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公共图书馆，中世纪时演变为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图书馆，产业革命后又产生了近现代的图书馆。这是一种演变、递进的完整过程。而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在近代之后则中断了，藏书楼也消亡了，而不是转变成了什么。中国的图书馆从产生之日起，走的便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是在新的起点上从头开始的。从本质上看，中国近代图书馆所接受和继承的主要是西方图书馆的东西，而

不是中国藏书楼的传统。这是一种取代，而不是演变过渡。这就如同一幢房屋的旧主人被新主人所代替，而这位新主人既不是由旧主人洗心革面而成的，也不是旧主人的儿孙，只不过是新主人入主之后受到了旧主人的一些影响而已。

澄清以上诸多的认识，都是为了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是从接受西方的图书馆思想及管理方法之后才开始的。我们姑且将之称为“中国图书馆西来说”，并把其视为研究中国图书馆历史的正确起点。

我们知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既有循序渐进、前后衔接的情况，也有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的情况，而且新事物并不一定要直接产生于旧事物的母体。中国的图书馆即属于后者。这样的事例历史上有很多，如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但科学社会主义的源头却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只能从全国解放时算起，至多追溯到“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之时，若在古代中国寻觅社会主义思想的前身和起源只能是牵强的。

这样说来，是不是将中国古代几千年藏书的历史及其巨大社会作用一笔抹煞掉了呢？事实并非如此。举例讲，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科学技术，涌现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巨匠，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然而，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并不是继承了张衡、祖冲之或道家炼丹术的传统，而是直接发源于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伽利略、牛顿等西方科学家。中国古代的图书馆也是如此，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不仅存在，而且是辉煌的；但从近代图书馆的发展源头看，它又是“不存在”的，因为历史并没

有让它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母体。本书无意否认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存在、发展与鼎盛的历史,而是旨在说明中国近代图书馆在本质上是一个外来的事物,是“西风东渐”的结果,而不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基础之上的。

将中国图书馆的历史界定在近代社会之后,也是图书馆史研究上的需要。专项历史的研究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研究范畴,图书馆史研究也不例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图书馆史与书史、出版史、校雠史、目录史、档案史等是无法区分的,而且年代越早,这些学科门类越趋于一体。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这些不同的范畴才逐渐有了明确的分野。为合理界定古代中国图书馆史,许多研究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有的人人为地划出“古代图书馆史”,有的界定为“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有的说成“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还有的更广义地称为“文献信息史”。然而,在这些论著中,或是分而不清,或是混而不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图书馆史的界定问题,其原因皆在于没有认清中国的图书馆实质上是“舶来品”,而是用现代图书馆的概念去套用古代社会中相类似的事物。^① 如果将中国图书馆的产生界定在近代社会之后,就会使中国图书馆史的研究有了一个清晰明确的范畴和途径。

从以上认识出发,本书所论及的实质上是在中国社会中所发生的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转变(确切讲来,这种变化是社会文献收藏以藏书楼为主体到以图书馆为主体的转变,而不是指藏书楼转变成了图书馆),也是旧式藏书楼消亡、新型图

^① 只有严文郁先生所著《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认为中国图书馆的历史从清末开始,这是比较合理的界定。但书中所确立的起始年代较本书稍晚了一些。

书馆产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接受了西方图书馆的思想方法并加以实践,这种接受和实践的程度如何,就是衡量中国图书馆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又以中国的文献收藏从封闭到开放,以及开放的程度如何作为最主要的衡量尺度,因为藏书开放的水平实质上便是“西化”的主要标志。本书即侧重描述这个过程。书中所复盖的年代,大约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至辛亥革命前后的半个多世纪,亦即中国的图书馆从酝酿、萌芽、实施,直至最后形成的年代。

二、藏书·藏书楼·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的渊源

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注曰:“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这就是藏书一词的最早出处。老子所职掌的周王室藏书室,也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

然而,藏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实际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得多。据传说,上古伏羲氏画八卦始有文献,黄帝时已有分掌文献的史官,夏代也有负责图籍的太史。《河图》、《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都是远古文献的名称。上古传说固然渺不足征,但至迟在商代,即已有了可以确信的各类藏书:本世纪初发现的殷商甲骨文献,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藏书实物;《尚书》中关于商代“有典有册”的藏书记载,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①即使在周朝,周王室藏书的历史也远早于老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

子，藏书也不仅限于周王所藏。可以断言，我国古代的藏书，远在华夏文明初始的年代即已发端，并伴随了中华古代文明几千年历史之始终。

我国古代的藏书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藏书”一词，实际上便是我国古代文献收藏的总称。将文献的聚集称之为藏书，是前人的一贯说法。例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①“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②等记载，便是例证。

至于“藏书楼”一词，则是一种较为晚出的说法。藏书楼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似乎还很难考定，但不会早于唐宋之际，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据《新唐书·李邕传》记载：“……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氏书楼。”又据《郡斋读书志》载：“（唐朝孙长孺）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这两处唐代的私人藏书，大概就是最早被称作藏书楼的文献收藏了。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了鼎盛时代，藏书楼之称便开始风行一时。私人藏书家们往往要将自己的藏书之所标之以“××楼”，“××阁”的雅称，就是一些没有多少文献收藏的士大夫们，也常常为其书斋取个藏书楼的名号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官方的藏书，许多皇家和官府的藏书机构也开始仿效民间的藏书楼，冠之以各式藏书楼的名号。这样一来，“藏书楼”就成了当时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也就是说，尽管藏书楼作为一种藏书实体是古已有之的，但藏书楼这一特定名称是

① 《汉书·艺文志》。

② 《新唐书·艺文志》。

唐宋之际才见于记载,并于明清之际开始普遍在社会上盛行的。

当代图书馆史的研究者们习惯于把我国古代的藏书机构统称为藏书楼,而把近代的新式文献收藏称之为图书馆,并把这一历史变化的过程归结为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转变。这种说法固然不无道理,但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实际上,将我国古代的文献收藏称为“藏书”,可能要比藏书楼的称谓更为适宜。因为藏书楼只能说是唐宋之后文献收藏处所的名称,并且以私家藏书为主,以藏书楼之所藏来囊括我国古代所有时期和所有类型的藏书是有些牵强的;同时,早期的近代图书馆问世后,往往也标之以藏书楼之名。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皖省藏书楼等,以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名称之别来作为二者区分的标志,也有些不够贴切。当然,这些称谓之分无关宏旨,重要的是这些文献收藏在性质上的差别。本书所要探讨的是我国图书馆形成的过程,将这个过程称之为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转变,也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因此,为了行文方便,也为了沿用习惯提法而避免与其他研究者产生歧义,这里也用藏书楼来泛指一切古代藏书机构。不过要申明的是:一,本书中所说的藏书楼是统称,既包括了殷商至清末的所有时期,也包括了官府、书院、私家等所有的藏书类型;二,清末出现的一些以藏书楼为名的近代图书馆,不属此例,对这样的“藏书楼”我们仍以图书馆视之。

与藏书楼源远流长的历史相反,“图书馆”在中国是个完全全的外来名词和近代文化现象。图书馆,在西方语言中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 Library. 另一个是 Bibliothek. Library 一词源自拉丁语的 Liber,意为树皮。因为树皮曾用作书

写的材料,所以在意大利语中把书店叫 Libreria,而法语中则把书店称作 Librairie。这个词后来由法语进入英语,就成了 Library。而 Bibliothek 一词源自希腊语 Biblos,即书籍,由书写材料“纸莎草”(Papyrus)的希腊语读音而来。后来对于存书的场所,希腊语叫 Bibliothek,拉丁语则称 Bibliotheca,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均用这一词称图书馆,只是在拼法上有些小差别。对于 Library 或 Bibliothek,中国人最初译为“藏书楼”或“公共藏书楼”。

中文“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出自日文“図書館”,最初是由梁启超引进到中国来的。1896年9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但是这一新的提法似乎并没有马上为国人所接受,一些早期的近代图书馆仍以“藏书楼”称之者居多,也有的称“书藏”、“书籍馆”,“图书院”,“藏书院”等。据目前所知,在本世纪之前只有1897年建立的北京通艺学堂图书馆使用了图书馆的名称。从本世纪初年起,使用图书馆一词的人和文献才开始多了起来。例如,1900年9月的《清议报》上就有一篇名为《古图书馆》的文章;1901年6月的《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幼稚园盲哑学校图书馆规则》。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图书,以资考证”,并规定其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①这是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所正式采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后,原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便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这是我国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

^①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正式官方藏书机构。但由于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在先,所以改名后人们仍习惯以旧名称之,使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这一正式名称反而不为人们所注意。直到1904年,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图书馆的名称才开始在社会上通行,其后各地出现的各种新型藏书处所多数都标之以图书馆的名称。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奉旨筹建,清政府又随之颁发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样才使得图书馆的名称在我国最后确立了下来。

从“图书馆”一词的传入和使用上,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国的图书馆是一个新生的外来事物,是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从头起步的。然而,藏书楼和图书馆又不仅仅是名词称谓上的差异,更有着性质上的重大差别。从藏书楼到图书馆,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最为重大的一场变革。藏书楼和图书馆,一是具有几千年传统的“国粹”,一是西方传入的新事物,是否“西化”便是二者的本质差别。关于“西化”的含义,可以列举出许多,如组织机构、管理方法、收藏内容等,但是最主要、最本质的一点,还是封闭与开放的区别。从封闭走向开放,便是我国图书馆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的曲折历程。

封闭性是旧式藏书楼的重要特征。在古代藏书初兴的殷周二朝,文化上是“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守”的状况,反映在藏书方面,则是“官守其书”的局面,^① 贵族统治阶级之外的广大民众是与文化、图书无缘的。春秋末年,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通过毕生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始了“学在官府”向“学到民间”的转变,使得众多的平民有了拥有、阅读图书的可能,这是我国

^① 章学诚《校讎通义》卷一。